



内源发展

—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 018 9827 8

内源发展

——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

黄高智

范如湖

雅克·布斯凯

皮埃尔·多凯斯

贝尔纳·罗西埃

哈迈德·伊卜拉希姆-穆斯勒伊

罗朗·科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1·北京

**Développement endogène:
Aspects qualitatifs et facteurs stratégiques**

© UNESCO 1988

Chinese Edition: © UNESCO 1991

UNESCO ISBN: 92-3-502543-5

作者对本书所载事实的选择及其说明以及所表达的观点负责，它们并不一定反映教科文组织的意见，故不使本组织承担责任。

本出版物中所使用的称呼和所载的资料并不意味教科文组织在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以及其国界或界限的走向方面表明任何立场。

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9.25印张 字数230(千)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4.45元

ISBN7-5001-0150-3/F·34

出版说明

本公司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翻译出版《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一书。本书是由黄高智主编的另一部论述第三世界国家内源发展问题的著作。他主编的另外两部著作《参与式行政与内源发展》和《发展的新战略》已由本公司翻译出版。

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是一个关键问题,一条是自力更生的内源发展道路,一条是照搬西方模式的外源发展道路。本书阐述了当今的一些发展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具体国家的案例研究,明确指出,只有依照本国的国情,利用本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继承本国的文化传统,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我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条内源发展的道路。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陈雅丽(前言及第一、四、五、七章),边文龙(第二、六章),李学文(第三章);校订张本,罗洁珍(第六章);责任编辑臧惠娟。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一九九〇年

前 言

本书是在教科文组织第二个《中期规划》(1984—1989年)重大计划VIII“发展行动的原则、战略和方法”中的计划VIII.1“对发展的研究和规划”,特别是专门研究各社会文化背景中发展过程的分计划的范围内编写的。该分计划旨在阐明各种因素,特别是属于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的各种因素与发展目的之间许多复杂的内在联系,并阐明国家发展前景与国际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事实上,收入本书的几篇不同的研究报告分析了发展方面的具体事实、文化价值以及各种选择的问题。

人们不禁要说,又是一些新的理论、战略和概念……它们是发展的道路呢,还是新的死胡同?然而,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教科文组织因此而根据教育,科技进步,新闻与交流的发展,以及各国文化表达形式和特性等可能在发展方面起作用的因素,调整了其探讨问题以及开展活动的方向,以便促进全面的福利。

教科文组织在致力于发展的数十年间,一直在不断努力工作。教科文组织正是通过确定本身促进发展的行动计划,而加强了发展的文化方面。

当今,在各种新的需求与具体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能性之间,在人口过剩的城市与劳动生产力依然极为低下的农村之间,仍然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可憎的贫穷现象的一个深刻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这一现象还在不断地扩大到许多面临着生存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贫穷与人口增长的恶性循环正在日益加剧,如果贫穷问题得不到解决,人口的增长和环境的逐步恶化将不可能得到控制。

但是,发展是多方面的,不仅限于单纯的经济发展。因为虽

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是发展概念的一些具体方面，但它们也是互为补充的，综合在一起就能确保一种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愿望的全球发展。持久的发展只能是所有人的发展，是国际性和全球性的发展。

今天，由于各国人民和各个民族越来越相互依存，国际合作的指导思想应是针对许多社会应克服的挑战的一种总体观念。因此，形势使得人们必须立即寻求尊重各国选择和相互声援的新的社会准则，因为相互依存也是行动的机会，是在帮助他国进步的同时，更好地确认其存在的机会。

许多社会都面临着发展自己固有的潜力和有选择地接受外来的质的帮助等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如果说发展应依靠财物在数量上的增加，那么也应适应共同的价值，一致的灵感，共同的希望和需要，因为这些方面可以体现整个国家这个集体，并能动员这个集体的意志、活力和集体想象力。正是根据这一要求，看来有必要考虑生产机构的现代化过程和由每个国家人民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的问题。

发展应是由内部发生的，因为一个社会要发展，就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应从它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中汲取力量。因此，发展应成为所有社会，无论是工业化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社会体系经常变革的一个现实。

只有当发展能够加强和巩固社会的创造力时，发展才显得有意义；只有由充分认识到发展的必要性，有能力并决心付诸行动的人们来承担发展任务时，发展才有成功的可能。重要的问题是要把人及其能力视为关键因素，要赋予人执意一往无前的理由，要灵活调整技术、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革新，使革新的每个阶段都由人民自己来承担，并使人民感到发展是一种创造性的、有益的超越。

因此，现实发展中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本书所要阐明的国家和

国际方面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中的发展问题。

首先人们可能提出的而本书加以阐明的问题是了解各种有关的因素在内源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作者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分析特殊形势和理论方案的同时，分析了内源发展的多种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历史和文化、教育和社会结构、科学和技术、经济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发展的过程。这种分析强调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方面性，并表明研究和探讨应自由地开展，应着眼于对新途径的探索，从而为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和福利作出贡献。

本书第一部分分析发展的前景和目的。黄高智从开放的社会文化角度对发展、互助与和平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虽然发展减轻了大众的贫困，并使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某些提高，但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常常造成文化、社会和人道方面的严重后果。

通过对汉字“和平”一词进行词源分析，他证实了和平与团结一致以及公正、均衡和协调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人类幸福的前提不仅要有社会和平，而且还要有内在和平(安)，这表明发展在人道、伦理和精神方面的重要性。

根据丰富的文化多样性，通过发扬独创性来寻求更为真实的普遍性，作者赞成进行与当代问题和重大利益范围相称的真正的国际文化合作。

范如潮调查了有关内源发展的潜力和障碍问题，他着重指出，强调和吸收当地的知识和技能是必不可少的。做何种选择呢？在现代化方面，是为了技术进步，还是为了制订使综合创造性和社会革新更好地适应各国现实与潜力的新技术政策呢？

在合作方面，“能否帮助他国按本国方式发展”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雅克·布斯凯对此作了论述。

正视历史的复杂性并兼顾其重大利害关系，从这个角度了解

发展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如能从中吸取教益可能解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制订发展战略方面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这是皮埃尔·多凯斯和贝尔纳·罗西埃共同探讨的内容。

本书第二部分分析内源发展经验的动力问题。

在这一部分，通过下述几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确定了内源发展的一些特点和战略因素：埃及注重传统技术，为促进内源发展将现代技术在功用上变通应用(哈迈德·伊卜拉希姆-穆斯勒伊)；然后介绍一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不同发展因素与发展人员之间相互动力作用的参考资料(罗朗·科兰)；最后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综述(黄高智)。

本书所收集的各篇研究报告探索了未来的道路，这是掌握科技进步，进行教育和文化革新以及掌握组织、生产和交流方式的必由之路。每位作者的不同方法和经验都是为了寻求内源发展的各种战略因素与质量方面的新的平衡，以及国家发展前景与国际环境之间的新的平衡。

本书所表达的观点，所选择的事实及其所作的说明均由作者负责，并不一定反映教科文组织的意见。

目 录

第一章	从开放的社会文化角度论述发展、和平与团结黄高智(1)
------------	-------------------------------------

第一部分 内源发展的前景与条件

第二章	内源发展作为另一种选择——可能性与障碍范如湖(25)
第三章	能否帮助他国以自己的方式发展?雅克·布斯凯(61)
第四章	今日的发展问题应正视历史皮埃尔·多凯斯与贝尔纳·罗西埃(79)

第二部分 内源发展实践经验的动力

第五章	从内源发展的角度发扬传统技术, 改造利用现代技术...哈迈德·伊卜拉希姆·埃勒-穆斯勒伊 (103)
第六章	内源发展战略中人员与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罗朗·科兰(172)
第七章	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及内源和自主发展的战略因素黄高智(264)

作者简介

第一章

从开放的社会文化角度论述 发展、和平与团结

黄高智

“人者仁也。”

——孟子

发展已成为当代一个关键性问题和各国优先关注的事项，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各个社会才能确保实现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愿望，才能促进每个人发挥创造潜力。但是，由于世界局势恶化，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可能构成对和平的真正威胁，发展的现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安。除此之外，军备竞赛也使解决发展问题减少了可能性，增添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交流和联系的世界化，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加及其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扩展，虽然各国间和各国内部存在差异，国际社会严重对立，但磋商机构和合作机制日益增多”^①，发展已不再是某一国或某一类国家的问题，而越来越被认为是全球性的问题。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既受不发达状况和畸形发展之害，也受目前国际经济混乱所造成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待遇之苦，它们是一系列不顾人类团结、一味贪财重利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受害者。此外，许多工业化国家也对这种“畸形发展”感到不安，从而使它们对不能满足各阶层居民愿望的现代性的依据和后果产生了疑问。当前的模式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工业化、城市化、技术进步和加入世界市场的方法把发展视为国家货币收入的直线增长。这种模

式看来不足以充分说明发展对人类服务的真正目的和条件。因此，越来越迫切需要对实施发展的目的、步骤、政策和方法重新进行深入探讨。

此外还应指出，“由于目前的经济困难使人们更增加了疑问，有一些早在60年代末（在工业化国家）就提出了。当时，经济增长正处于高峰时期，因此人们关注的并不是经济衰退的后果，而是蓬勃发展的后果……对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产生的疑问常常表现为忧虑。似乎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恢复至今仍占优势的增长节奏和方式，或是找到实现某种增长的途径，这种增长远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包括文化与人的发展的目标并能满足全人类的总体需要和愿望……（因为，）应当指出，一方面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工业潜力，有时甚至是农业潜力，实际上仍然未被充分利用，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却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这就产生了一个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性的，又是伦理性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既有贫穷甚至赤贫的地区，也有与之完全不同的因极大富足而成为问题的地区”。②

此外，有必要提及，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关于“世界性问题与中期规划（1984—1989年）方针”的决议4XC/1/01中曾强调指出，“目前世界的所有问题都具有文化含义；文化既是发展的一个方面，也是发展的目的”，大会认为“正因为如此，特别要从最广义的文化中探求应付当代世界种种挑战的真正答案，这一探求本身就表明对未来人和人具有创造和平、正义与团结的能力满怀信心”。③

这项关于发展、团结与和平相互关系的研究正是在社会缺乏协调、世界平衡失调的背景下，从开放的社会文化角度提出的。

和平与发展的关系

虽然发展已成为当代人类各项活动的主要课题，但直至不久

以前它还不是所有社会、其中包括而且主要是各文明国家所寻求的崇高利益。当现代派于18世纪在西方进行的有关“人类进步”的论战中战胜古典派之后，发展的概念才逐渐站住脚，随后产生了资本主义和当前的发展主义思想。的确，发展减轻了大众的贫困程度，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总的说来，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文化和人道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此，不得不根据人类的整体愿望和整体需要，以深入批判和更为开放的观点重新探讨进步与发展的概念。

发展主义的思想，特别是生产本位主义思想运用的是过分注重物质和经济方面的狭隘发展概念，从长远来看，它会以其危险的简化论影响各国和全人类的未来，因为和平与文明既依赖于发展，又包括甚至超出了发展的范围。

因此，凡是主要的文明均把和平作为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之上的崇高利益加以追求。我们可以用中国文化为例，分析一下汉字“和平”一词的词源和含义。汉字“和平”一词包含并意味着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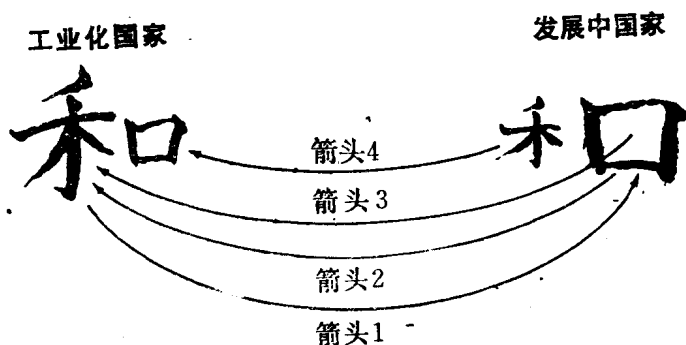
首先，表意文字“和”由两个词根组成：第一，“禾”指稻谷或小麦（木字象形文字的写法为：枝条两端向上翘起，根部扎在土里，顶端是谷穗），第二，“口”代表嘴（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成）。

“和”字的意思是：当每张嘴里都有了米饭时，才有和平。因此，只是在所有的人都有食物时，和平才能得到保证。这说明了一个极其现实的和平概念，我们可以把透过表意文字“和”（在汉字里已存在四千余年）的这一中国传统概念与联合国最近宣布承认的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和平的条件进行对照。的确，“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但是，在发展相互了解的教育和培养宽容精神，进行舆论宣传，启发人类和平意识的同时，必须创造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以使和平的内容具体化，

因为“饿汉听不进忠告”。

因此，和平包含着发展，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其实，“和平”一词中的“和”字意即发展，而“平”字——表示秩序和对称——则意味着平衡、协调。平衡和协调的概念是一切有机体生存的基础，但它也必须是一种积极的平衡。也可以说，“和平”的“和”字表示数量方面，而“平”字则表示和平的质量要求。因此，和平意味着发展，但却是在平衡和协调中求得发展，而不是无条理、无秩序、不均衡、不协调的发展。

参照各国和国际上有关发展的具体经验，当代的基本要求应是协调与平衡，而不仅是扩展与扩张。事实上，目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日趋严重。下图通过分析“和”字，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可动用资源与需求失调（现有的粮食太少，而人口太多）而造成的贫困与赤贫现象又因分配不当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导致社会冲突与动乱的根源。相反，在发达国家，过于富足（粮食过多，而人口太少）倒成了问题。目前工业化世界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下列几种现象造成的：人口的老化倾向是由于出生率低，相比之下，技术生产能力过高，再者，由于经济理性主义和唯利是图的赢利主义，使财富集中于已经过富的地方而使

这一状况更加恶化。(人们不是说：“千条江河归大海”吗?)过于富足和物质畸形发展,造成人在品质和伦理方面的平衡失调。如果说在不发达国家,冲突往往是由焦虑、失望和生存需要造成的,那么,在高度工业化国家,暴力和侵犯行为(少年犯罪、傲慢无理、流氓行为等)则是由积存的能量和能力过剩造成的。不过,正如所有的活的机体一样,人类社会的各类平衡失调——不足或过剩——均可由于协调受到破坏而引起疾病或不适。(此外,发达国家最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由于营养过剩和深居简出造成的:糖尿病、高血压等)。因此,迫切需要鼓励恢复平衡的活动,建立有关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平衡和协调关系。

在世界范围内(在国家范围内也适用),第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把富国的剩余资源调拨给穷国。通过国际援助发展就是这样做的(见图表箭头1),这种援助有时是慷慨的,有时是精打细算的,但往往都是不充足的。

寻求恢复平衡的第二种办法(多少带有自发性)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移居发达国家,以寻求职业和面包(见箭头2)。这两种逆向运动——一方面援助来自北部,另一方面大批劳动者来自南部——无疑会起到减轻世界经济平衡失调的补充作用。的确,把物质资源——资金流通,技术援助——调往需要的地方比接待移民劳动者所带来的问题要少,后一种做法久而久之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及人道方面的问题。因此,北部国家清醒地意识到,宁愿以令人满意的规模发展第一种做法,即把足够的粮食调拨给饥饿的人,而不愿使急需维持生计的穷人“和平而秘密地涌入”繁荣地区。

上述两种办法实际上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可以防止出现悲剧性结果和一触即发的局面;因为如果这两种缓和途径被彻底堵死,则平衡进一步失调,穷人就有可能铤而走险和诉诸暴力,世界和平将真正受到威胁,那将是“公开的暴力入侵”(见箭头3)。

不幸得很,人们势必发现,一方面,在北部各国面临经济危

机的同时，上述两种调节途径近几年也经历了重重障碍；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市场规律和国际经济关系等机制，使穷国仅有的一点资源外流到富国，而富国则往往以令人愤慨的方式任意浪费（见箭头4）；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不利于国际合作及世界和平。

因此，急需克服狭隘的经济理性主义和超越通常政治上的打算，以加强涉及各个社会的人类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如今已成为以所有领域相互紧密依存为特点的世界的关键。）“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多样性也从来没有这样明显……世界是一个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各部分组成的统一体”。④为形成更加入道的世界新秩序就应根据这一看法建立新的结构。

在工业化国家，发展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对捐赠者和接受者来说实行分配和互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有益的——献血可帮助贫血者，但同时也减轻了肥胖者的痛苦——但条件是要借助现代化的交流手段，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动员舆论并提高发达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认识，使他们意识到和平与幸福对包括富有者和贫困者在内的所有民众都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从道义上的互助到法定的团结

如果再参考一下中国的文化和文字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人”的本义含有“团结”的意思。有人曾问孔子的大弟子孟子：什么是人？孟子答曰：“人者仁也。”造就人的是“仁”这一美德。因为，“仁”这一表意文字是由两个方块字组成的：人（象形文字是亻）和“二”（由两横表示）。作为人，就要与他人在一起，人与人之间就要和睦、和平共处、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首要的、真正的品质。这和不久前存在主义提出的“他人

是我的地狱”这一断言是格格不入的。特别在西方，某些哲学学说和宗教教义把人说成是具有不可改变的独创性和独特个性的生物——这往往导致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而中国哲学则认为人是相互依存的生物，如与世隔绝或与他人断绝来往，既无法生存，也不会幸福。显而易见，目前占统治地位的两个发展模式看来都认为幸福的鲁宾逊，以及幸福的无个性群体或无名集体都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人是由一条纽带与他人，首先与其亲人，其次与其社团、同胞、同类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在与周围的人保持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人不会丧失个性，而这种个性应广泛地接受合作、友谊和爱，不仅爱邻人，而且也爱所有的人——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孔子）——和所有的生灵〔参见佛教，不仅无限同情现有的、可见和不可见的、近或远的一切生灵，而且也无限同情生存过的和即将诞生的一切生灵。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节制地利用大自然（生态学）；要同超自然环境（宗教和信仰）保持协调的关系；要感谢我们的先辈（道德、伦理）；要对我们的后代负有责任（预见）〕。

建立在哲学概念和道德价值基础上的团结自然更加注重相互援助，并赋予合作以一种更加自发的内部意向，以一种更为人道的深度。但是，要想大规模地发展合作，以解决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也有困难。因为不得不指出，相互依赖虽然在各个领域越来越明显，但团结的意识在各民族之间尚未真正形成。因此，在发展团结的伦理方面的同时，有必要将发展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以使团结从道德义务的范畴过渡到受法律约束的范畴。如没有这种新方法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真正依据，国际合作将因其单方面的特点、慷慨的表象和明显的非理性而在国家范围内继续被看作是一种慈善事业，而实际上，交换物——即使不是经济上的，至少也是政治上或战略上的，总而言之是玄奥的——往往会趋

向恢复原来的支配关系或加剧地位的不平等现象。现代国际发展法学家认为，有三项原则使北部各国对南部发展负有责任^⑥：

第一项原则是各国法律承认，而且国际法也适用的损害赔偿法：“由于其过失而造成损失者，必须以实物或等同物予以赔偿”^⑦。这类损失如，“过度开发可再生或非再生资源，国际贸易方面的不平等条款，虚假的和有利可图的技术转让，不公正的国际货币制度等”。这一赔偿概念可用来说明国际援助的理由。

第二项原则是补偿性的不平等原则。各国法律平等的原则通常意味着“所有国家在各方面都享有同等待遇”，在目前的普遍情况下，这只能加剧不平等现象。“按照平等原则固有的精神，必须给予补偿性的不平等待遇，这一点虽然尚未成为现实，但却作为一项目标提了出来”。^⑧因此，补偿性的不平等原则一方面说明了区别对待的理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补偿权的理由。

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其他一些富国在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所谓“狄龙”谈判中才同意不要求绝对互惠，而1967年阿尔及尔七十七国宪章也曾要求无条件废除互惠原则。此外，发展中国家往往强调不言明的互惠的理由：因为，假如穷国利用从富国得到的好处，它们可以出口更多的东西，鉴于其需求量很大，它们必然用增加的收入向工业化国家购买其他东西。因此，工业化国家肯定可从穷国扩大出口所增加的各种收入中获益，因而不必要求后者作出让步。

1975年以来的持续衰退，表明第三世界市场对工业化国家总体要求降低予以补偿从而限制这些国家的失业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与法国之间的工业产品交换，使法国在1970—1976年间的就业人数净增十万。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最近对其所有成员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观察员指出，1960—1980年期间，经合发组织所有成员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曾